

【关中文化专题】

# 从宋氏家庭移民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军户移民现象

宋元梁

(西安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21)

**摘要:**家族移民史是中华民族迁移史的微观基础,明代武功县宋家堡宋氏家庭移民的原因和时间的历史溯源,对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庞大的军户移民有一叶知秋的学术价值。研究采取历史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试图还原明代中叶宋氏家庭军垦移民的历史真相,继而为了解明代陕西庞大军户的形成奠定微观基础。明代在陕西实施的军屯移民战略,可稳定国防、充实“宽乡”、减轻赋役,形成明代特殊的移民方式,使陕西成为全国军户移民最多的省份。宋氏父子两代人的血泪移民史,是明代陕西军户移民现象的缩影。

**关键词:**明代中叶;宋氏家庭;军屯制度;军户移民

**中图分类号:**C9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24)01-0065-07

**收稿日期:**2023-05-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人口结构调整理论中国化研究(17XJA790005)

**作者简介:**宋元梁,男,陕西武功人,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

DOI:10.15924/j.cnki.1009-5128.2024.01.006

赎马村宋家,古称宋家堡,坐落在关中西部、中华农都、苏武故里——陕西省武功县,自明代宋氏先祖——山西人宋肇晋移民建村于此,迄今繁衍21代人,越500余年,现有居民562户,户籍人口2268人,其中,同宗宋姓人口占九成。

1963年4月修订的《宋氏族谱》序云:“余祖姓宋氏,前辈口传,系山西大槐树下之人。明代某年,迁居至此。迁来始祖,有子三人。二人又客居洋县。其后子孙繁衍,已有今日宋家村之名称。……明代至今,五百有余载。”序言共122个字,所记载的信息非常有限。其中,宋氏先祖究竟因何来此?什么时间迁来定居?“前辈口传”宋氏先祖系山西大槐树下之人,移民来源地是否真实可靠?明代宋氏移民武功与陕西大量的军屯移民有无关联?

由于宋家堡微观村史的研究资料缺乏,族谱所记载的信息有限。因此,研究借助明代相关史料进行同期历史分析,依据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康海(1475—1540)所著《武功县志》(1519年刊印)的方志资料、数据进行背景描述和统计分析。同

时,参照邻村——伊家村的《伊氏族谱》信息,对《宋氏族谱》进行代际回溯,以确定宋氏先祖移民建村时间和移民原因,考察明代宋氏移民与陕西军屯移民之间的关系,还原历史真相,弥补微观移民史特别是军垦移民史研究的不足,为其他姓氏军垦移民研究提供参考,为优秀家族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支持。

## 一、引言

《大美百科全书》认为,人类的迁移是指个人或一群人穿越相当的距离而作的永久性移动。<sup>[1]61</sup>《辞海》将移民解释为“在一国内部,较大数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sup>[2]4010</sup>。葛剑雄等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认为移民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sup>[3]1</sup>。

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环节。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

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sup>[4]619</sup>在每一个人均应占有若干亩土地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就给这样做造成了障碍。要想消除这种障碍,就得实行移民。<sup>[5]494</sup>如果个别地方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当地全体居民需要时,过剩人口应迁往他处移民的组织 and 费用以及农具供应等概有国家负责。移民应按下列次序办理:首先是自愿迁移的无地农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员、逃兵等,最后,才采取抽签或协商的办法。<sup>[6]239</sup>

文献研究是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主要手段,其来源包括官方史籍的记载、其他古籍中的记载、家谱、地方志等。<sup>[7]</sup>在中国历史上,移民运动从北到南、从东向西,由平原向丘陵、山地,几千年流动不息,其背后所反映的正是“人”与“地”之间的系统交流,移民运动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人口和资源的重新组合。<sup>[8]</sup>

在中国移民史上人数最多的是两类移民:一类是统治者运用官方的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或者强制推行的,以及在社会的或自然的外力压迫下大规模爆发的;一类是下层民众为了逃避天灾人祸,维持生存,追求温饱而自发进行的。<sup>[7]</sup>

明代山东省是国内最大的移民接纳区之一,移民来自山西、河南、江苏、河北、东北等多个地区。<sup>[9]</sup>豫北地区移民在明代移民史上具有重要位置。移民类型及其来源,主要有政府组织的移民、地方招抚的移民、军户、藩封移民以及任官、谋生、工商等其他自主移民类型,这些移民既有来自山西,也有来自山东、陕西、南北直隶等周边省份。<sup>[10]</sup>

军卫人口迁入,是人口迁移的重要表现形式。明初政府从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向外迁民,加上出于国防需要在战略要地设置卫所进行的移民屯垦。<sup>[11]3</sup>明代山西都司和行都司是抵御旧元的前沿阵地,明廷在此设立卫所数量较多,终明一代在山西行都司下设立的卫所共有 28 卫、3 护卫和 11 个千户所。<sup>[12]</sup>

明代的军户在全国户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山西、陕西、北直隶往往是两三户中就有一家军户,更大者是军民户各占一半,或者是军多于民。<sup>[13]</sup>军丁赴卫,必须携妻子同行,以防逃跑。明

代的卫所制度,在宣德之后逐渐衰弱,于是,明政府便在正统二年(1437)六月开始在陕西招募民兵,加强边防的军事实力。明代中期,民兵在北边的防御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尤以陕西的民兵战斗力最强。<sup>[13]</sup>

早在宣德年间,北方的流民队伍已逐渐形成。弘治十五年(1502)马广升奏说:“窃照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人民数少,出产甚多,其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并陕西所属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粮差,或因畏当军匠,及因本处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汉中府地方金州等处居住。彼处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所以人乐居此,不肯还乡。目今各处流民,在彼不下十万以上。”<sup>[14]</sup>

中外有关古代移民、特别是明代移民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明代军卫移民作为一支庞大的历史存在,却著述很少,明代关中地区有关军户移民的微观研究则更为鲜见。

明代陕西作为西北边防重地,地广人稀,卫所及其驻军众多,军队给养供应十分困难。为此,政府鼓励部分驻军就地为农成为垦殖军户,因而,军卫垦殖及其就地落户构成了陕西乃至全国一支特殊的移民大军。初步考据,军卫移民从明代初期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宋氏先祖正是以军卫移民的方式于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垦殖定居于武功县的。

## 二、明代初期山西移民的主要分布

明代建国初期,因推翻元朝夺权的持续战争,伤亡人口众多,人口分布畸形,主要集中在江南、晋南等地区,导致人地失衡,北方耕地大量荒芜,直接影响国家赋税收入和国防安全,于是,明初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国大移民。

### (一)明初全国掀起移民潮

经过元末战乱,山东、河南竟“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从开封到河北,“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洪武实录》卷二十九)。因此,明代建国初年,面对全国人口与土地严重失衡状态,随之掀起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移民迁徙浪潮。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 700 万,华北地区移民 490 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 150 万,合计 1 340 万,移民人口占到当时

全国总人口的19%。<sup>[3]391</sup>

## (二)明初山西移民的主要去向

元末明初,山西南部因山河险阻聚集大量人口,自然成为明政府迁出移民的重地。文献记载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共有18次,自洪武六年(1373)起,至永乐十五年(1417)止,外迁人口达100万之多<sup>[15]48-50</sup>,向全国移民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洪洞大槐树移民”现象,“洪洞大槐树”似乎代表了全国移民的符号。

从官方史料看,是否存在山西移民于关中的现象?明初官方记录的山西移民去向主要有:

洪武四年三月,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洪武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洪武二十一年,后屡徙……山西民于……北平。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河北田,赐钞,备农具。洪武二十二年十月,时上以山西地涸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山西无田民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明成祖二年九月,徙山西万户民实北京。明成祖三年九月,徙山西万户民实北京。

可见,明初山西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河南、河北、北京、凤阳、山东等地。<sup>[16]362-363</sup>

## (三)明初陕西移民的官方记录

明政府诏令与陕西移民相关的记录有:

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下令:“迁山西汾、平、泽、潞之民于河西,任土垦田,世业其家。”(乾隆《绥德州直隶州志》卷三)此次山西移民主要被安置在今陕北一带。

洪武十三年(1380),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凤阳、淮安、扬州、庐州,许民尽力开垦,有司无得起科(明《续通考》)。这条诏令说明,明初陕西也属于宽乡,地广人稀,是吸纳移民垦殖的省份之一,但为何没有山西大槐树移民关中的官方记录?可能的解释是:一河之隔的关中地区与“狭乡”晋南地区的生产、生活、语言及风俗习惯基本一致,明初洪洞大槐树周边的农民,自发组织移民于关中“宽乡”的民间力量大、数量多;再者,关中地区不是明政府移民优惠政策光顾的重点区域。

永乐元年(1403),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等府无田粮

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复免差役五年(《明会典》)。洪武十三年陕西尚属于宽乡,怎么时隔二十年就变成向北京移民的狭乡?这其实是明政府令陕西及多地殷实大户实畿辅政策的延续。

明宣德二年(1427),宣宗“命陕西、四川流徙迁徙罪囚,发汉中沔县为民”(《明宣德实录》卷二十六)。沔县即今陕西勉县。这一批迁入的人口,全部为陕西及四川各地的罪犯,人数不会太多。

明初移民主要集中在洪武、永乐两朝的近50年间。在明代,关中地区主要是人口迁出地区,而陕南、陕北则是重要的人口迁入地区。<sup>[17]</sup>“太祖时徙民最多。……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明史·食货志》)

据《宋氏族谱》和代际推算,宋氏先祖是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落户武功县的,与明初山西大槐树移民相差半个多世纪,明初政府的移民政策早已结束,即使想私自移入武功这类土地肥沃的平原县,是无法获得耕地的,何以安身立命?!因此,宋氏先祖系明初山西大槐树移民之说不能成立。

## 三、明代正德年武功县军屯移民分析

明初实施的军屯制度,就是通过政府向驻守卫所的部分军士及其军属无偿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农具和资金等,鼓励军士就地垦殖落户,亦兵亦农,成为当地军户,广泛耕种土地,扩大粮草等战略物资供给,满足军需民用,缓解庞大驻军的粮草需求危机。

### (一)明初以降陕西军屯移民的特殊性

明代陕西布政司和都司、行都司管辖着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广袤地区,统8府21属州95属县,是防御西北地区外族入侵中原的前沿。为防范边外鞑靼族和北部俺答汗蒙古族侵扰中原,明政府沿长城一线设9边镇,驻军把守,其中4镇在陕西,驻兵20多万人(含马匹10万多),所需军饷粮草主要依靠陕西传输。<sup>[18]2</sup>

由于庞大的驻军粮草消耗数量大,而陕西及西北地区人烟稀少,地旷路遥,粮草、布等战略物资的供应和运输,仅靠陕西境内有限的人力和赋税,是

无法满足驻军庞大需求的。于是,明太祖果断采取了军屯、民屯和商屯(“食盐开中”)等政策相互配合,陕西实行的主要是军屯<sup>[19]149</sup>,很快便解决了粮草供给问题,稳定了陕西边防和新生政权。

明初以来,陕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其中以军屯规模最大。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下令在陕西开展军屯,规定陕西屯军五丁抽一去搞屯种,税粮照田例,又规定屯军种田 500 亩者,岁仅纳粮 50 石(明《续文献统考》)。洪武二十六年(1393),陕西都司及所属卫所的屯田面积共有 29 444 顷(《明史·食货志》);到嘉靖初年(1522),陕西共有军卫屯田 150 554 户,352 000 余人,屯地 122 305 顷,收屯粮 96 632 石,屯草 859 000 余束<sup>[19]149</sup>,军屯面积全国第一,屯田遍及关中和陕南、陕北各军卫所在府州,对解决明政府的军需民食,起了很大作用。洪武十九年(1386),陕西都司辖 24 卫,其中在今陕西境内就有 10 卫,仅西安府就下辖左、右、前、后 4 卫;在陕西屯田的卫所士兵有不少来自本境,但也有相当部分来自外省。<sup>[17]102</sup> 武功县当时归西安府管辖,驻军当属左卫。

据伊家村《伊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伊哲,是来自直隶凤阳驻守武功县凤阳坡军营的一名参事,于洪武十年(1377)响应政府号召,就地垦殖落户为农,成为关中地区军卫移民的典型。伊哲所落户的伊家村,南距宋家村、北距凤阳坡驻军营地均不到两千米。现在的武功县贞元镇凤阳坡村,就是因明初凤阳军队驻守当地而得名的。

陕西落实军屯制度产生了积极效果。第一,大大减轻了当地农民的税粮负担,保持明朝新生政权的稳定。第二,减少了粮草长途运输成本与耗损,减轻了徭役和政府支出负担。第三,通过军卫移民充实了当地人口,实现了人地平衡和经济增长。第四,外来军户与当地住户的交融共生,实现了文化融合与社会繁荣。明代的军屯制度,其实就是战国以来农战制度和西汉边疆军屯制度的延续,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如此,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兵民结合,稳固边防。

## (二)至明代中叶武功县军屯移民比重大

明代沿袭元代户籍管理制度,将人户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等。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

低,不得应试,并要世代承袭。根据康海《武功县志》第 2 卷第 4 篇《田赋志》记载:“正德七年(1512)武功县有田地 1 862 顷 34 亩 5 分 7 厘;总户数 1 978 户,总人口 27 431 人;其中,民户 977 户,军户 919 户,匠户 33 户,名尉力士户 5 户,厨户 1 户,打捕、阴阳、医户各 2 户,乐户 9 户。”<sup>[20]47</sup>

康海《武功县志》撰写和刊印年代(1519),与宋氏先祖落户和生产、生活于武功县宋家村的时间大体重合,因而,根据县志所计算的相关数据,可以直观静态地反映包括宋家村在内的武功县农村基本的经济社会状况。

武功县户均人口 14 人。封建时代人口以传统大家庭形式存在,便于家庭内部分工和生产协作,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根据县志所计算出的户均人口数,明显偏高。根据《陕西粮食史志资料汇编》数据计算,嘉靖初年(1522),陕西军户户均 2.34 人,即不足 3 人。<sup>[19]149</sup>

武功县户均田地 0.94 顷,即 94 亩,人均 6.71 亩。根据《陕西粮食史志资料汇编》数据计算,嘉靖初年(1522),陕西军户户均屯田 0.81 顷(即 81 亩),军户人均 9 亩。<sup>[19]148-149</sup>

武功县住户结构以务农为主。务农为业的民户、军户占县域总户数的绝对优势,占比高达 95.85%,而其他非农行业户仅占 4.15%,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

武功县军户比重高。军户占全县总户数的 46.46%,几乎与民户相当,表明从明代初期实施军屯制度至明代中叶正德七年(1512),军卫在武功县转为军屯垦殖定居的户数大幅增加,产生了军屯垦殖新的移民方式,实现了移民安邦充实边防地区的国家战略,与明政府的边防重地军屯垦殖诏令落实完全相符。

军户兵役负担沉重。明初编制的军户仍未废除,到明中叶,军户依然照旧出军丁赴卫所服役,实际上在农村中就形成了双重的兵役,既要出军丁,又要征调民兵。嘉靖(1522—1566)中期以后,虽实行了民兵纳银制,而一些沿边及交通要冲地区,仍要金派民兵,轮流戍守府、州、县的城防,像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推行的是三重兵役制,既出军丁,又要征派民兵,还要负担民兵银两。<sup>[13]</sup>

宋氏先祖于明弘治十六年以军卫或军籍继承人的身份在武功县扎根,成为众多垦殖军户中的成员和宋家立户建村第一人。但宋氏先祖家庭作为军户,社会地位低于民户,耕种官田的赋税高于民田,还要承受繁重的兵役之苦。

#### 四、宋氏先祖移民成因再考

关于明代宋氏先祖移民的成因,由于《宋氏族谱》中缺少详细的文字记录,坊间流行多种说法。

##### (一)宋氏先祖移民武功县的因由再考

第一,明初山西大槐树移民说。元末明初的封建政权更替,长期战乱使关中人口大量死亡或逃亡,肥沃土地缺少农民耕种,明政府便从人口富集的晋南洪洞大槐树处办理移民陕西事宜,宋氏先祖便成为移民关中的成员,似乎与族谱记载一致。

第二,关中大地震后移民说。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大地震,死亡83万人,致使关中地区人烟稀少,大量土地闲置,直接影响明政府征粮和财政收入。于是,明政府鼓励山西、河南等邻省移民入关中。

第三,水土饶益吸引说。关中平原水多田肥,沃野千里,号称陆海,天府之国,秦汉至明清,关中平原一直拥有全国最肥沃土壤的美誉,土地产量高,自然吸引着宋氏先祖由晋入陕。

第四,流民逃难说。宋氏先祖移居武功,可能与山西原籍少地、失地或无地、受灾或赋役繁重等因素有关,便流落到武功县宋家村落户、繁衍。

第五,亲朋示范说。元末明初移民关中的山西籍人士已有良好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亲朋好友引荐,也可能是宋氏先祖迁移来陕的重要诱因。

第六,军卫军屯说。明代陕西的军屯移民持续时间长,宋氏先祖就是明弘治年驻守在武功县卫所的一名军卫,或者是一名山西籍的军籍继承人,响应政府号召,就地军屯垦殖定居下来,类似于伊家先祖定居模式。

六种说法似乎各有道理,但历史不能选择,只存在唯一性。伊家村的《伊氏族谱》清晰记录,为厘清宋氏先祖移民成因和定居时间提供了重要参照。

根据2019年新修订的《伊氏族谱》可知,自伊氏先祖伊哲于明洪武十年(1377)就地军垦落户以

来,迄今共有26代人,建村600多年,现有居民330户,1255人,其中,伊氏同宗人口占八成。1963年重修的《宋氏族谱》记载,自宋氏先祖宋肇晋移民落户武功县宋家村500余年,共18代人。至今过去了60年,应加上3代人,现(实际)有21代人,与伊家26代人比相差5代人。由此证明,伊家建村早于宋家建村五代人约125年(每代人按25年左右计算)。据此推算,伊氏先祖伊哲定居伊家是洪武十年(1377)以后,加125年,则宋氏先祖宋肇晋移民定居的时间大约为明弘治十六年(1503),距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晚了半个多世纪。因此,宋氏先祖系明初山西大槐树移民之说不能成立。

然而,仍有三个困惑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大地震后的移民困惑。华县大地震同样严重波及离震中很近的晋南地区,该地区人口同样大减,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再次移民关中,理论上和事实上都不合逻辑。若此,宋氏先祖移民定居武功县宋家村所述的第二条途径不可能,第三至第五条亦可以排除,只有第六条途径——军卫屯垦移民的可信度最高。

第二,宋氏先祖三个儿子诞生地困惑。是宋肇晋从山西带过来的军垦军属,还是在陕山西籍军卫落户宋家村以后所生?两种可能性均存在。若是军户,为何族谱载宋氏先祖来自山西大槐树?若是祖籍来自山西大槐树附近地区的军人或者军籍继承人,则能完全解释清楚。

第三,宋氏先祖两个儿子冒险再迁困惑。农业社会父(母)子骨肉分离是最痛苦的一件事,那么,为何宋氏家庭落户武功县大约二十年光景,其两个儿子又要迁往陕南洋县,是地少不够种,还是家庭纠纷或对外纠纷所致?

##### (二)宋氏家庭两个儿子被迫迁移的原因分析

据《宋氏族谱》记载,宋氏先祖宋肇晋定居于武功县宋家村,时过不久,其两个儿子又迁移去了陕南洋县,骨肉分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细读康海《武功县志》田赋志和《陕西粮食史志资料汇编》等资料,两兄弟迁往洋县定居的原因豁然开朗。

武功县当时的田赋、丁赋太高。根据《武功县志》数据计算,宋氏家庭在弘治(1488—1505)、正德

(1506—1521)年间,每年全家需要缴纳的赋税,包括粮食 1 306 斤;棉布 2.72 丈;丝锦重 1 两 2 钱,折收商税 4.75 贯;丁赋包括食盐钞 39.06 贯。<sup>[20]47-50</sup>按照明律,军户耕种官田的赋税高于一般民田,加之地方胥吏、豪民等巧避赋税,落在宋氏等军户家庭的赋税负担更甚。

旱疫饥荒加剧了人口迁移。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陕西大饥,武功民王瑾杀宿客而食之;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陕西诸郡大旱疫<sup>[19]50</sup>,此时间节点与宋氏家庭两个儿子外迁陕南洋县的时间高度契合。

陕南地广人稀适于生产生活。汉中盆地的气候温润、雨多水沛,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优越。秦巴山地辽阔,“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sup>[21]16</sup>。况且,在此耕种“既不纳粮,又不当差,所以人乐居此,不肯还乡”<sup>[13]</sup>。

军户的兵役负担沉重。宋氏家庭作为军户,按政府规定,既要出军丁、又要征派民兵,还要负担民兵银两。随着长子宋英、次子宋廉两个兄弟陆续长大成丁,家庭的兵役、丁赋负担势必加重,两个儿子外逃异乡似乎已在冥冥之中。

宋氏家庭两个儿子与乡邻军户子弟结伴外逃。严重的赋税、兵役之苦,不仅残酷地折磨着宋氏一个军户家庭,而且同样危害着武功县及其他地方众多军户家庭。于是,大量军户家庭的丁口被迫结伙外逃迁徙,成为流民。武功县到洋县,五百多华里,沿着悦骆古道,跋山涉水,结伴前行,可以共同抵御路途风险和移居风险。

明朝政府因惧怕流民进山造反难以剿灭,一直采取禁止流民进入秦巴山区垦殖的政策。如洪武诏令“禁隔山场,民不许入”,“凡窃取者,以律问罪,乃枷号三月以示众”(《明宪宗成化实录》卷五十)。明中期以来,由于服役繁重、自然灾害频繁,陕西的流民数量日益增多,关中地区人口纷纷流入陕南。<sup>[17]100</sup>

于是,两难的家庭会议最终决定让已成丁的长子宋英、次子宋廉两兄弟冒险离开赋税兵役过重和旱疫肆虐的武功县,过渭河,翻秦岭,最终定居耕耘于汉中洋县,但却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由此推定,宋氏先祖的两个儿子迁居汉中洋县的时间大约

在宋氏先祖定居武功后的 20 年左右,即关中大旱疫的 1521 年前后。因当时三儿子宋兴尚小,未成年(丁),不具备在外闯荡的能力,只好留在父母身边;再者,若无特殊情况,传统农民家庭的父母是不会让长子外出闯荡的。

## 五、结语

明代中叶,宋肇晋作为驻守武功县境内的军士,后垦殖定居于宋家村。宋氏军户家庭父子两代人的血泪移民史,是当时关中众多军户家庭移民史的一个时代缩影。综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明代陕西作为西北边防重地,军卫移民持续的时间长、规模大,形成一支特殊的军屯移民方式。陕西的军屯移民数量众多,正德七年(1512)关中地区武功县的军户占比高达 46.46%。第二,宋氏先祖是山西籍驻守武功县军营的一名军士。宋氏先祖宋肇晋,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响应政府军垦号召,就地在武功县定居务农,成为垦殖军户,也成为宋家村立户建村第一人。第三,明代中叶陕西军户的赋税和兵役负担沉重不堪。宋氏家庭作为军户,随着两个儿子陆续成丁,兵役、丁赋势必加重,加之陕西诸郡大旱疫肆虐,宋氏两兄弟被迫迁居陕南洋县。第四,明代陕西的军户移民现象研究值得重视。考察明代宋氏先祖移民与陕西军屯移民之间的关系,还原历史真相,弥补明代军垦移民史研究的不足,为关中其他姓氏明代军垦移民的研究提供参考。

## 参考文献:

- [1] 光复书局大美百科全书编辑部. 大美百科全书:第 19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
- [2]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 [3]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 简明中国移民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列宁. 列宁全集:第 2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7] 葛剑雄. 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J]. 浙江社会科学, 1997(4): 82-91.
- [8] 关文. 追寻中国史的潜流: 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评价[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8(2): 84-87.
- [9] 刘娟娟. 明清山东移民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 [10] 靳文豪. 明代豫北移民若干问题研究[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3.
- [11] 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 [M]. 葛剑雄,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12] 武慧. 明代山西军卫移民研究: 基于《武职选簿》的考察[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 [13] 田培栋. 论明代北方五省的赋役负担[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4): 35-43
- [14] 徐平华. 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波动与人口关系初探[J]. 中国史研究, 1997(3): 13-21
- [15] 张青. 洪洞大槐树移民志[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
- [16] 谭其骧. 中国移民史要[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 [17] 薛平拴. 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J]. 中国历史地理, 2001(1): 99-128.
- [18] 李刚. 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 [19] 崔振禄, 李式嵘. 陕西粮食史志资料汇编[Z]. 西安: 陕西粮食志编纂委员会, 1993.
- [20] 康海. 武功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 [21] 严如煜.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责任编辑 马俊】

## A Perspective on the Phenomenon of Military Family Emigration in Shaanxi from the Case of Song Family Emigration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SONG Yuan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family emigration is the micro-foundation of 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emigration of the Song family in Songjiapu, Wugong County in Ming Dynasty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uge military emigration in Shaanxi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rying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e Song family military settlement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and then lays a micro-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military migration strategy implemented in Shaanxi in Ming Dynasty stabilized the national defense, enriched the "pacification of countryside", reduced the taxes and corvée, formed a special immigration mode in Ming Dynasty, and made Shaanxi the province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military immigrants. The bloody and tearful immigration history of Song family of two generations is the epitome of the phenomenon of military family immigration in Shaanx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ddle Ming Dynasty; Song family; military settlement system; military emigration